

#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

Marxism and the City

[美] 艾拉·卡茨纳尔逊 著  
王爱松 译

... expression of "the city".

than any I know, Mumford's summary sociological concept of the city' provides the subject, even as it justifies and commends the scope of the study.

Judgement is made that, of course, open to question is the research programme and strategies to use. These are important, but second-order issues. In this book, however, most of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author are of the first order. The city, comparis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like are not germane; for others they are.

Both the author and Mumford are both insistent and influential in widening the range of the study to include the socialist experience. This has been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the author's later work and that of others, such as David Harvey's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

Marxism and the City

[美] 艾拉·卡茨纳尔逊 著  
王爱松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 / 张鸿雁、顾华明主编.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11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ISBN 978 - 7 - 5499 - 3642 - 7

I . ①马… II . ①张… III . ①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 IV . ①C912.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8368 号



"MARXISM AND THE CIT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2.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书名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
著者	[美]艾拉·卡茨纳尔逊
译者	王爱松
责任编辑	任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a href="http://www.1088.com.cn">http://www.1088.com.cn</a>
照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厂址	江苏省南京市新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 399 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40 000
版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499 - 3642 - 7
定价	42.00 元
网店地址	<a href="http://jsfhjy.taobao.com">http://jsfhjy.taobao.com</a>
新浪微博	<a href="http://e.weibo.com/jsfhjy">http://e.weibo.com/jsfhjy</a>
邮购电话	025 - 85406265, 845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 - 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 序

张鸿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类城市化的发展既有共同规律，也有不同国家各自发展的特殊道路和独有特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当一个人已在一种独特的文明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并经常试图找到这种文明的源头及其所由发展的道路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朝另一个方向侧瞥上一眼，询问一下该文明未来的命运以及它注定要经历什么样的变迁。”<sup>①</sup> 经典作家认为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动力，全球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和历程证明，凡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基本是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例外。<sup>②</sup> 同样，中国以往的城市化历史经验也证明，要想使作为国家战略的中国新型城镇化能够健康发展并达到预期目标，就必须总结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

<sup>①</sup>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明》，徐洋、何桂全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1.1。

<sup>②</sup> 张鸿雁、谢静，《城市进化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与治理创新》。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特别要择优汲取西方城市化的先进理论和经验以避免走弯路。<sup>①</sup> 我研究城市化和城市社会问题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借此机会把我以往积累的一些研究成果、观点和认识重新提出来供读者参考。

## 一、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反思与优化选择

2013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 52%，正在接近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中国成为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关键是，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将仍然处于继续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而且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的社会变迁期。这一典型的社会变迁——中国新型城镇化关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和质量以及社会的公平问题。

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方面，如城市空间正义理论、适度紧缩的城市发展理论、有机秩序理论、生态城市理论、拼贴城市理论、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花园城市理论、智慧城市理论、城市群理论以及相关城市规划理论等，这些成就对人类城市化的理论有着巨大的贡献，在推进人类城市化的进化方面起到了直接的作用。中国城市化需要在对西方城市化理论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方城市化理论进行扬弃性的运用，从而最终能够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体系与范式。

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我们解决的手段却越来越少，甚至面对有些问题我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为什么会这样？即使在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的西方国家，在当代仍然存在着普遍的和多样化的社会问题<sup>②</sup>，而且在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也都

---

<sup>①</sup> 张鸿雁，“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社会学研究》，2013.3。

<sup>②</sup> 参见张鸿雁，《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城市可持续创新战略》。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集中在城市，形成典型的“城市社会问题”。如城市贫困、城市就业、城市住房、城市老人社会、城市社会犯罪、富人社区与穷人社区的隔离、城市住区与就业空间的分离、城市中心区衰落以及城市蔓延化等问题，甚至有些在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已经解决的社会问题，仍然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社会中不断发生。这些现象的发生，与我们缺乏对西方城市化理论与模式的全面理解与择优运用有关。

在建构中国本土化城市理论的过程中，对外来城市化理论进行有比较地、批判性地筛选，这不失为一种谨慎的方式。西方城市化发展过程所表现的“集中与分散”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创新形成的，可以描述为高度集中与高度分散的“双重地域结构效应”。<sup>①</sup> 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高度集中，与美国近 80% 左右的人居住在中小城镇里的高度分散，就是这种“双重地域结构效应”的反映。西方城市化理论是以多元化和多流派的方式构成并存在的，既有强调城市化“集中性”价值的一派，亦有强调城市化“分散化”价值的一派，还有强调集中与分散结构的流派。回顾以往，在某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则把西方城市人口集中的流派作为主要的理论核心模式，如果 21 世纪初的城市化仍然把城市高度人口集中作为主导，这不仅是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误读，更是对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严重误导。而事实上，中国通过“制度型城市化”的创造，以西方城市化理论中的集中派理论模式为“模本”，形成了高速与高度集聚的畸形城市化——中国式“拉美经济陷阱”<sup>②</sup>。过度集中和过度集权的城市化成为导

---

<sup>①</sup> 张鸿雁，《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sup>②</sup> “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南美洲巴西等国家，人均 GDP 超过 3 000 美元，城市化率达到 82%，但贫困人口却占国家人口总数的 34%。一方面是经济较快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趋缓；一方面是社会有所富裕，另一方面却是贫困人口增加……在其总人口中有相当规模的人口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参见：王建平，“避免‘拉美陷阱’”，《资料通讯》，2004(4).46。

致“都市病”深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从基本国情的角度讲，仅适于美国等人少地多国家的“城市过度造美运动”以及大尺度、大规模占用土地资源的城市化，推行到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中国是基本不可行的，从长远利益角度来认识、分析这种现象，这是一种破坏性建设。

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中，还有些成果要么是戏剧化的，要么是过于理想化的——从乌托邦的视角提出城镇化的理论，被喻为“要构建一个虚拟的理想世界”<sup>①</sup>，在学理性和科学性方面缺乏社会实践基础，在创造理想模式方面的价值大于实际应用价值。当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创造“理想类型”，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空间来加以探讨和完善。西方城市化理论与世界任何理论一样，有其合理内核，亦有典型的历史与现实局限，必须认真选择，优化运用。

## 二、中西城市化发展的差异认知

与西方城市化“动力因”相似的是，中国城镇化的外在形式也是以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但是，除此而外，中国城镇化在发展“动力因”的构成与序列上，非但不同于西方，而且还有着强烈的本土化“制度型动力体系”构成特点，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通过“政府制度型安排”形成高速的城镇化。所谓“制度型城镇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城镇化与城市战略的规划是政府管控的；二是城镇化与城市建设的投资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三是城镇化的人口发展模式是政府规划的；四是城市的土地是由政府掌握的，等等。这一动力模式具有强大的权力力量的优势，同时也具有典型的行政命令的弱点。中国城镇化以三十多年的时间跃然走过了西方两百年的城镇化路程，成就令世界瞩目，

---

<sup>①</sup> 尼格尔·泰勒，《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李白玉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24~25。

但城市社会问题也越来越深化——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城市化原动力不足、动力结构不合理的事，其主要症结在于中国没有本土化的科学的城市理论来引导。

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制度体系结构与个体价值观、人口总量与结构、教育水平与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表现在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和发展水平方面，同时还表现在文化的总体价值取向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承袭了古典时代思想，并且是从中世纪的土壤中“自然长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长入”的方式显现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在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机制内，使得在城市化中出现的社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文化结构转型，能够基本处于同步进化的结构变迁之中，没有出现典型的“社会差距”与“文化差距”。这些证明了西方城市化发展的市场规律运性表现。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以来，中西方城市化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两种城市化形态的社会前提、进程、节点和社会结构都是不同的。

西方城市化早期的历史是“双核动力发展模式”，即“城市经济”与“庄园经济”构成“双重动力”，城市工商业和庄园手工业并行发展，中世纪从庄园里逃亡出来的手工业者，较快地转入了工业化的大工业生产。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也可以完整解释为“双核地域空间模式”。而中国是典型的集权的传统农业社会，可以解释为“单核地域空间模式”，城市在汪洋大海般的农业社会中生存，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土地关系和契约关系，由此产生的城市化“与传统农村有千丝万缕联系”，及至当代仍然是尚未与传统乡村“剪断脐带”的城市化。这一轮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在土地制度上有所突破，进行中国式的“第三次土地革命”<sup>①</sup>，只有这样才能融入世界城市化和全球一体化浪潮之中。

---

<sup>①</sup> 张鸿雁，“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与第六次城市革命”，《城市问题》，2008.1。

### 三、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经历了多种形式的城市社会结构变迁过程<sup>①</sup>，这种变迁在总体上是一种社会进步型的发展。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是这一变迁的继续，我们不难看到，在城市化的进化型变迁中，在解决传统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这是符合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没有不存在问题的社会，亦如发展本身就是问题，现代社会就是风险社会的命题一样，社会存在本身就是问题。因当代中国的城镇化具有历史的空前绝后性，其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繁杂：有些是传统社会问题，即没有城镇化也存在；有些是城镇化引发和激化了的问题，要梳理出关键点加以解决。

“当我们渐近 20 世纪的尾声之时，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的地区：那里的国家对公共官僚和文官制度表示满意。”<sup>②</sup> 这是美国学者帕特里夏·英格拉姆在研究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模式时的一段论述。正因为如此，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进行制度改革，只是改革的方式和声势不同，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把改革与创新作为同一层次的认知方式，而不是把改革作为一种运动的方式。亨廷顿曾有针对性地对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提出这样的分析：“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面临着“政党与城乡差别”的社会现实，事实上中国的改革面临的社会现实正是“城乡差异”二元结构深刻的特殊社会历史时期，当代的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都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有关。他认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和城市人口增长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

---

<sup>①</sup> 张鸿雁等，《1949 中国城市：五千年的历史切面》。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sup>②</sup> 《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39。

给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中国城乡差别的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型城镇化战略就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建构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城市市民社会。

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说：“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事实。”<sup>①</sup>人类伟大的文化总是属于城市的，这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人们对城市向往的原因所在。对于城市的“伟大”认知不止于斯宾格勒，早在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在1588年出版的《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一书就提出了“城市伟大文化”的建构与认知。他对城市的评价是这样的：“何谓城市，及城市的伟大被认为是什么？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则被认为并非其处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人们现在出于各种因由和时机移向那里并聚集起来：其源，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快乐，有的是复兴。”<sup>②</sup>我惊叹于四百多年前的学者能够对城市有如此独到而精辟的论述，虽然这种论述包含着对王权价值的认同，但论者能够从独立的视野中发现城市的价值实是难能可贵。而且，四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也充分证实了这种美誉式的判断。同样，也是在四百多年前，乔万尼·波特若还提出了创造城市伟大文化的方式与入径：“要把一城市推向伟大，单靠自身土地的丰饶是不够的。”<sup>③</sup>城市的发展、建设和再创造，要靠城市公平、开放和创造自由。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的出版目的十分明确：我国的城市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西方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或是可以善加利用的工具，

---

①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9。

② 乔万尼·波特若，《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③ 同上。

有助于形成并完善我们自己城市理论的系统建构。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新型的城镇化过程中，避免西方城市化进程中曾出现的失误。新型城镇化是在建立一种新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是改变传统农民生活的一种历史性的改变。“新的城镇，也会体现出同社会组织中的现代观念有关的原则，如合理性、秩序和效率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城镇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学校。”<sup>①</sup>

该丛书引进西方城市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大致涵盖了相关领域的重要主题，它以新角度和新方法所开启的新视野，所探讨的新问题，具有前沿性、实证性和并置性等特点，带给我们很多有意义的思考与启发。

学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城市化实践经验，研究发达国家新的城市化管理体系，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功能。但是，由于能力有限，丛书一定会有很多问题，也借此请教大方之家。读者如果能够从中获取一二，也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张鸿雁：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院长  
中国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会长  
(2013年11月于慎独斋)

---

<sup>①</sup>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 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19。

# 前言

由于在东欧失败，在西欧受损，并且缺乏博学或通俗的支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统治指南已经衰落。为什么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版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虽然即使在资本主义和民主国家里，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和批评资源，但为什么要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作为社会和实践理论，在其整个发展的时间跨度中，马克思主义对城市谈论得相对较少。此外，在 20 世纪末，城市本身已经变得蔓延开来、模糊不清（像伟大的可汗地图集最后几页上的城市），甚至也许走到了根本没有构成一个有意义的范畴的一步。

我写作《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最重要的原因，集中在两个基于直觉的想法。第一个想法是，尽管作为一个认知和统治方式的整体有其所有深刻的、根基不牢的瑕疵，马克思主义依然是理解和质疑现代性关键方面的一个有用工具，此外，在自由公民权和自由市场在概念竞争上获得决定性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维度（虽然是以一种比马克思主义者一度所希望的远为谦逊的方式）现在可能还是找到了一种新的意义——作为思想和政治摩擦的一种资源。第二个想法是，通过迫使马克思主义认真地介入城市-空间议题（尤其是在处于所有有用的社会理论之核心的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方面），作为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关键弱点可以得到弥补。简言之，我认为这一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长篇大论、沉思默想的论文，能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分析做出更有力量的

(即使是很有限的和谦逊的) 贡献。

在一定程度上，我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城市这一明显特殊的主题是出于个人和学术的原因。当开始思考本书时，我已经完成了一卷论述美国城市和工人阶级形成的书。我不满意《城市战壕：都市政治与美国阶级的模式化过程》(*City Trenches: Urban Politics and the Patternning of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潜在的、未加考察但不是很显著的亲马克思主义品质。那本书间接地对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学术著作做出了贡献，并且对那时流行的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致力于城市的著作提出了具有同情理解的批评。然而，《城市战壕》的中心推动力，是关注美国的阶级、政治和集体行动问题——这些问题通常被浓缩到了“美国例外论”的标签之下——这样一个焦点让我奢侈地间接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城市研究的某些关键问题。

事实证明，受邀写作《马克思主义与城市》在这一时刻为我提供了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机会——此时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正开始第一次在其思想和学术史中将城市认真地当作社会理论的一个构成要素加以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内部聚焦城市是由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20世纪60年代的开拓性著作所发动的。他从对诸如此类城市领域的基础性批判开始，进而走向了对城市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诸如曼纽尔·卡斯特尔 (Manuel Castells)、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克里斯·皮克万斯 (Chris Pickvance)、多琳·马西 (Doreen Massey)、约翰·洛杰金 (John Lojkine)、沙伦·祖金 (Sharon Zukin)、克里斯蒂安·托帕洛夫 (Christian Topalov) 等天才的思想大师以及许多其他地质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手中，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了城市领域改革的主要源泉。图书馆杂志收藏的相对新来者——《空间与社会》(*Space and Society*)、《国际城市与地域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对跖地》(*Antipode*)——在了解城市研究的范式转变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至少对年轻学者来说是如此）。今天，在经历了一个

强烈的创造期之后，这种学术努力的活力已减退，或至少已变得更为散漫。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是否已到一个结束或停滞期还不完全清楚，但总之，这是一个盘点的好时间。

然而，《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主要不是一部评述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主题-素材呈现出了其他承诺。城市总是其文明的浓缩。假如其密度变了，那么它也会暴露出某些东西。通过聚焦作为空间中的点、具有确定形式的地方、人类活动之场所，从这一视角有可能阐明历史的关键层面、可替代的社会理论适用性。我认为，通过聚焦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有助于对现代西方城市发展做出解释的方式；聚焦马克思主义如何可能将城市和城市空间整合到它自己的分析框架之中，可能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能力做出评价。我试图表明：通过纳入一个城市-空间维度，马克思的主要分析工程是如何得到加强的，而且，反过来，城市研究的某些主题和我们对城市的理解，是如何经由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而得到说明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相遇有助于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中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特征是由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研究生部充满活力的学术气候塑造出来的，这里的同仁们提醒我学术工作就是私人行为和集体行为间的平衡。我要特别感谢詹奈特·阿布-卢古德 (Janet Abu-Lughod)、杰弗里·戈德法布 (Jeffrey Goldfarb)、戴维·古登 (David Gordon)、诺曼·费恩斯坦 (Norman Fainstein, 现在在纽约城市大学)、阿旺·谢克 (Anwar Shaikh)、查尔斯·蒂莉 (Charles Tilly)，他们阅读了原稿的一个早期版本并提出了口头批评。我要感谢安德鲁·阿拉托 (Andrew Arato)、杰罗米·布鲁纳 (Jerome Bruner)、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罗伯特·海尔布伦纳 (Robert Heilbroner)、索尼娅·克鲁克斯 (Sonia Kruks, 现在 Oberlin 学院)、克劳斯·奥菲 (Claus Offe)、罗斯·汤姆森 (Ross Thomson)、路易斯·蒂莉 (Louise Tilly)、阿里斯蒂德斯·佐尔伯格 (Aristide Zolberg)，他们在社会变化研究中心研讨班和研究生部常规讲习会对

各章的讨论中也提出了建议。

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之外，史蒂文·卢克（Steven Lukes）富有价值的编辑评论促使我对原稿做出了完善。沙穆尔·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t）在罗素哲人基金会学术休假访问期间，慷慨地抽空对手稿各章进行了评论。事实证明，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社会结构与社会变化 A. E. 黑文斯（A. E. Havens）研究中心长达一周的逗留也尤有帮助，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奥林·赖特（Eric Olin Wright），还有戴维·沃德（David Ward）、伊凡·塞勒尼（Ivan Szelenyi）、罗杰斯·霍林斯沃思（Rogers Hollingsworth）、朱丽娅·亚当斯（Julia Adams）以及中心的其他成员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写作这本书时的一个特殊关键时刻去检验我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导引”丛书的两个编者之一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完稿之前仙逝。当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剑桥大学做学生时，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著作并听过他的演讲。自那以后，像无数其他人一样，我对他怀有莫大的敬意，并受到他杰出著作的引导。我十分高兴有机会在刚开始时与他讨论我写作本书的计划，并为能跻身他共同主编的丛书之中而深感荣幸。

社会研究新学院研究生部 艾拉·卡茨纳尔逊

##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总目

已出版,  待出版

-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
- 保卫空间
- 城市生活
- 消费空间
- 媒体城市
- 想象的城市
- 城市研究核心概念
- 城市地理学核心概念
- 政治地理学核心概念
- 规划学核心概念
- 真实城市
- 现代性与大都市
- 虚拟空间的社会和文化价值
- 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
- 城市发展规划本体论
- 区域、空间战略与可持续发展
- 全球资本主义与劳动力地理学
- 历史地理学核心概念

## | 目录

001 序

001 前言

00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

041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主题

088 第三章 走向重新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  
列斐伏尔、哈维与卡斯特尔

136 第四章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与阶级形成：  
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组织的旅程

152 第五章 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城市的地方

195 第六章 工人阶级图绘城市

245 第七章 重绘城市

293 主要参考书目